



战后 西欧 联合

周根源 著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战后西欧联合

周根源 著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后西欧联合/周根源著.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6. 7

ISBN 7-5623-0980-9

I. 战…

I. 周…

Ⅲ. 西欧—历史

Ⅳ. K56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五山 邮编 510641)

责任编辑 卢家明

全国各新华书店经销

华南理工大学印刷厂印装

开本: 787×1192 1/32 印张: 7.375 字数: 159 千字

1996 年 7 月第 1 版 199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3 000

定价: 9.80 元

目 录

第一章 欧洲联合思想的发轫与嬗变.....	1
一、旨在“弭兵”的古代联合理想发轫	1
二、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	2
三、欧洲的平衡	3
四、欧洲观念的先驱者	4
五、拿破仑帝国时期的欧洲	7
六、近代欧洲经济和政治的二律背反	9
七、两次世界大战间的欧洲.....	13
第二章 战后西欧联合发展历程概述	19
一、舒曼计划和欧洲煤钢联营集团的诞生.....	19
二、西欧联合四十年概略.....	26
第三章 战后西欧有关联合理论的分类	40
一、联邦主义与邦联主义.....	40
二、积极一体化与消极一体化.....	47
三、国际关系理论冲击波.....	54
第四章 战后西欧联合的初步形成	60
一、欧洲古文明遗踪.....	60
二、中世纪欧洲的多“面孔”.....	62
三、近现代欧洲新生成.....	67
四、战后初始西欧联合的奠基.....	74
第五章 战后西欧联合发展进程剖析	86

一、联邦主义者资志而没	86
二、涅槃中新生	89
三、“山重水复”与“柳暗花明”	98
四、欧洲大市场与政治联盟挂航	130
第六章 战后西欧联合的三次高潮	138
一、西欧联合第一次高潮的来临	138
二、西欧联合第二次高潮的再现	151
三、西欧联合第三次高潮的兴起	160
第七章 西欧联合的现状分析	166
一、欧洲内部市场建设	166
二、西欧政治联合的构筑	168
三、西欧联合的防务合作	171
四、西欧联合的冲刺	175
第八章 西欧邦联化与“欧洲的欧洲化”	178
一、西欧邦联化端倪已现	178
二、“欧洲的欧洲化”潜力与可能	181
三、联合明天面临三个挑战	186
第九章 西欧联合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94
一、国家、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	194
二、欧洲民族主义泛滥	208
三、一体化浪潮澎湃相激	219
四、国际问题层出不穷	228

第一章 欧洲联合思想的发轫与嬗变

一、旨在“弭兵”的古代联合理想发轫

联合(或统一)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中国古代的“合纵连横”外交和古希腊的提洛同盟、伯罗奔尼撒同盟即属此类问题。

纵观古今,横察中外,联合举动或理论大凡都因战争而诱发。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自从人类社会出现阶级以来,统治者为了种种“合理”或不合理的因素冲突不断。比如对未知地球的探求,对土地的垂涎,对宗教神圣的护卫……俯拾即是。战争过后,尸横遍野,人们从血的教训中力求避免这历史的恶性循环,联合于是为人们所垂青。因为它既可镇强,又可护弱,但如何形成一种机制的理论,有的靠几个说客,有的是统治者许诺或签约,不一而足。总之,人们祈望和平。

古籍有关记载,汗牛充栋。如我国春秋时期的“向戌弭兵”、“墨翟非攻”等。古代思想家也有很多关于和平的论述。孔子的“仁爱”思想就有和平与正义内涵。战国时,管仲建议齐桓公“九合诸侯”,避免了征战,孔子连声称赞说:“如其仁! 如其仁!”(《论语·宪问第十四》)老子在《道德经》中曾说:“佳兵不祥”。孟子谴责战争发动者“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犯罪行为,认为他们“罪不容于死”(《孟子·离娄章

句上》)。

古代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也是一种反对战争的和平运动。奥运会期间由伊利斯国王、斯巴达国王、比萨国王签订“神圣休战”协定，规定：奥林匹克是和平圣地，不允许任何武装进入。奥运会开幕时，由三名竞技者举着火炬，跑遍全希腊，传谕停止一切战争。西方有些学者认为，和平主义与基督教同时产生，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早期基督教教会的成员，在罗马的军队中曾拒绝作战，他们认为基督教教义是反对一切战争的。总的来说，古代反对战争，要求和平的运动多是在社会上层中进行，人民群众没有广泛发动起来。运动的形式一般是分散、孤立的少数人的活动，没有形成有组织的社会运动，也没有提出系统的理论思想。

二、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

中世纪的欧洲，封建制将它分割成无数小块，马克思用“一袋马铃薯”来形容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3页）但就是在这样的欧洲，也还继续存在着非常重要的同质性因素：同种类型的封建社会和极其活跃的宗教。当时存在着一个真正的信仰共同体，教皇享有崇高的威信，各种修道会遍布欧洲，它们的传道院可以毫无困难地从一国移往另一国。同样，那些信徒也可以到各国的圣地去朝拜。另外，这个欧洲在知识上或在仅留的一点知识上是统一的。由教会创建的大学组织形式到处都一样。教师和学生可以任意从一所大学转到另一所大学。拉丁语是欧洲文化的语言，是教会使用的语言，也是学者们使用的语言。对外，西欧基督教会（东欧为东正教所控制）也通过一些共同采取的行动表现出它的团结一致。

比如为收复“圣地”耶路撒冷和征服西班牙以及葡萄牙所进行的十字军东征。

因此，当时存在着某种形式的共同体，一个基督教“共和国”，一个精神上的“联合统一体”。

三、欧洲的平衡

从中世纪末起，欧洲出现了许多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国家。它们自己设立行政机构，建立常备军，实行定期收税。因此国家拥有非常可观的力量，这首先是西欧的一些大国如法国、英国等，然后在东欧也出现了一些民族国家如波兰、俄罗斯等。中欧在这方面是很落后的，直到18世纪末，还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特征。这些大国依靠的是通俗语言的发展和先后不同出现的民族感。通俗语言在中世纪中叶即开始使用了，民族感在百年战争时期的法国已很强烈。

随之，代替封建割据的是一些相互竞争的大的政治统一体的组成，而不是一个唯一的统一体。在这个欧洲从此便存在着一些强大的主权国家，它们的首脑有行动的绝对自由，不再服从于上级的戒律，完全不同于中世纪时基督教欧洲的情况。因此，欧洲在政治、经济上的分裂一时占了上风。这些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生存，维护它们的存在和独立。为了免受一个鼎盛国家的统治，其它各国自然地求助于结盟和联合。人们习惯于依靠联盟来对付霸权主义的企图。当法兰西王国从百年战争中崛起时，别的国家便结成联盟共同对付它。后来它们又以同样的方式对付查理帝国，反对哈布斯堡人要建立一个世界性君主国的企图。总之，按照《大国兴衰》一书作者的说法是，这一时期，国家结盟的经常变更就象一副“纸牌”在人们手

中不断变化。

平衡体系就是这样从 17 世纪到 18 世纪初逐渐形成了。1713 年签订的乌特勒支条约提到“强国之间完全的平衡”。乔治·利韦说：“人们看到了一个根据平衡理论所建立的真正的大陆组织，它建筑在反对主要列强的基础上，是通过一个巧妙的平衡体系来完成的，以防止其中某一个列强占优势，并随时便于求助于英国的仲裁。”18 世纪时，这个平衡体系确实在英国、法国、奥地利、俄罗斯、普鲁士这五个大国之间发挥了作用。但这个体系当时很难长期维持下去，因为各个王朝都有自己的野心，改朝换代会有政策变化危险。因此，平衡体系不排除战争，相反，它只能通过联盟成员的变换，通过战争和对领土的重新分割才能维持下去。平衡体系不会保证和平，而只能保证那些大君主国的存在。

随着平衡体系的付诸实施，有人想在理论上给一个由若干国家组成的“国家社会”下一个定义。有人认为，联盟是为了通过国际协定来维护大国间的平衡，保持解决领土问题的欧洲议会。17 世纪初叶费内隆论证道：“这种对维护邻国之间平衡与平等的关心是保证各国间平安无事的基础。在这方面，所有毗邻的和自由贸易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组成了一个大集体，一种共同体。比如，基督教世界是某种带有普遍性的共和国，它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对付共同的威胁，采取一致的预防措施。”

四、欧洲观念的先驱者

当世界历史进入近代时期，欧洲国家成为许多带有国际性影响事件的重要行为者与参与者。联合举动也不例外。这

是因为，“十五、十六世纪以后的四百年中，由欧洲西北角这一率先变化（即由农本而重商的变化，由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变化——引者）而引起的世界范围的经济、政治、文化的矛盾和适应，新旧嬗递之中的批判和吸收，外来力量与固有力量的冲击和溶汇，构成历史成为世界历史这一宏伟过程的全景。”（吴于廑《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3页）

近代以降，那些“计划设计者们”拟定了许多把欧洲各国组织起来的方案以使和平降临人间。近代以联合求和平的运动在理论上取得了许多成果。1625年，荷兰学者格劳秀斯呼吁卷入当时欧洲战争的国家签订和平条约，制定一项“战争与和平法”。格劳秀斯主张用法律手段制止战争，他是近代国际法的创始人。英国公谊会教徒威廉·佩思在1693年发表的一篇有关欧洲和平的短评中，主张建立一个“欧洲议会”，各国派驻议会的代表名额将和自己的人口与经济实力成比例。这个议会应根据3/4以上成员的意见作出决定，并拥有一支军队以使人们服从它的决定。于是和平便可以降临，贸易与繁荣也可得到发展，况且这样做还可以缩减军备开支。圣皮埃尔修道院院长有同样的意见。他在1713年发表的“争取欧洲永远和平的方案”就是想避免战争，发展贸易。为达此目的，各国君主应缔结一个永久的盟约，服从于一个“欧洲的参议院”，以2/3多数作出决定。参议院要拥有一支公共的军队，而各国军队的数量在和平时期是有限的，参议院还拥有各成员国交纳的捐款。

但是，君主们绝对不会同意放弃他们的行动自由并服从于多数人作出的决定，让-雅克·卢梭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只

有当君主们都很通情达理时，欧洲共和国才能实现；但他们的本质却是贪婪、好斗，而且他们的君主权既不容许分割也不容许限制。至于伏尔泰，他也是拥护把欧洲组织起来的，并对欧洲知识界的世界主义非常敏感，他认为圣皮埃尔修道院院长的方案是空想，而寄希望于弗雷德里克二世，希望他能实现欧洲的统一。但除了暴力外，弗雷德里克能用别的办法来实现这一统一吗？

德国哲学家埃马纽埃尔·康德在 1795 年也公布了一个永恒和平计划。他说，人的权利应建立在一个“由自由国家组成的联邦”之上，尽管他有美利坚合众国为榜样，但他还不敢设想到那种程度，只是建议各主权国家之间建立一种邦联式的同盟。

其它有关和平问题的较为著名的理论著作有：圣西门的《论社会组织》，蒲鲁东的《战争与和平》，约翰·鲍利灵的《和平在政治和商业上的重要性》，卡夫曼的《世界和平科学概要》等。英国学者玛利坎普贝尔斯密认为十九世纪是和平运动与和平结社的时代。1815 年在纽约成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和平协会，创始人是大卫·道奇。次年，在伦敦也成立了和平协会。最早的国际和平组织是 1830 年在日内瓦成立的欧洲和平协会。1845 年在伦敦召开了第一次国际性和平运动大会，参加的代表有欧洲大陆 6 人、美洲大陆 37 人和英国 294 人。（华超《世界和平运动》，商务印书馆，1934 年，第 48—49 页）此后，国际性和平会议多次举行，规模较大的有 1848、1849 年在布鲁塞尔，1850 年在法兰克福，1859 年在巴黎举行的国际性和平大会。

无论近代欧洲的学者们、政治家们对欧洲联合的思考如

何抽象，甚至是空想；无论近代史上以欧洲国家为主体，旨在团结求和平的大小活动中的影响如何不大，又不深远，但他们毕竟把眼光投向整个欧洲，他们是欧洲观念的先驱，是欧洲联合的第一批真正倡导者。

五、拿破仑帝国时期的欧洲

在法国大革命的 25 年(1789—1814)中，旧体制与均势的欧洲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在思想上和结构上，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和拿破仑帝国的法国都极力要摧毁旧秩序，要迫使人们接受一种新秩序。但法国的行动又是矛盾的：一方面它倡议自由这一理想，另一方面它又要扩大它的统治范围。这样做就不能把欧洲长期组织在一起，相反却导致了各国民族主义情绪的发展。

在拿破仑的统治下，为保卫大革命成果而进行的反对各国君主的战争很快就变成了解放的使命，变成吞并，变成了对别国领土的征服。在五人执政内阁(1795—1799)的统治下，法国的版图伸展到莱茵河与阿尔卑斯山脉，而且它周围还环绕着许多“兄弟共和国”(荷兰、瑞士、西萨尔潘、利居里安、罗马、帕泰诺巴)。这些共和国都是按照法国的模式，依靠当地“爱国者”的支持而组织起来的。欧洲的平衡不存在了，各国君主纷纷联合起来同这个过于强大的法国进行斗争。

拿破仑在头脑里有一个欧洲方案。他在圣赫勒拿岛是这样讲的，宣称他曾想“把欧洲的不同人民变为一个共同的人民。”他说，“我不认为欧洲会有其它大平衡的可能，这种平衡只能是欧洲伟大人民的聚合和联盟。”他似乎想过要统一欧洲的货币、度量衡以及立法。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理由并

不能解释拿破仑的行动。他当时想建立一个共同的帝国，还梦想获得东方。根据同英国斗争的需要，他把整个欧洲大陆集合起来，置于他的统治之下。他用这种方法组织起来的欧洲实际上是法国霸权的欧洲，而由于它在各个民族中所引起的抵抗情绪，这个欧洲是不牢固的。

拿破仑欧洲 1814 年宣告告终，此时，欧洲各国君主达成协议，同意恢复并巩固法国大革命之前存在的传统欧洲体系。奥地利首相梅特涅说，应该“恢复欧洲的平衡体系和各民族的权利”。当时法国和英国的外交部长塔列朗和卡斯尔雷都同意这种观点。这便是维也纳会议的产物，它根据合法性与平衡这两个原则重新划出了欧洲的版图。之所以需要合法性，是因为各国的当然首脑是君主，因此新的革命是不能容忍的。之所以需要平衡，则是因为各国君主都有保护他们的财产和抵御霸权主义行径的权力。

为捍卫欧洲的集体利益——对内是君主制的秩序，对外是平衡——某种合作就显得有必要了。因此便产生了后来被人称之为“欧洲国家集团”的体系。1815 年 9 月 26 日在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缔结的“神圣同盟”提到存在于一切欧洲民族之上的一个“基督教民族”的思想，也谈到各国君主之间团结的必要性。后来，英、法先后加入该组织。

这个体系是以“会议”的方式而运转的，也就是说首先各国君主间进行会晤，然后他们的大臣或他们的大使们再进行会谈，这还算不上一个国家组织。因为它没有组织宪章，没有总部，也没有秘书处，而且各种会议也不是定期召开的。这倒可以说是一个由大国组成的执政内阁，它在欧洲履行着一个事实上的政府职责。但是这种行动只对小国有影响，而大国之

间仍然没有任何仲裁体系。因此,只有当各个大国达成一致时,“欧洲国家集团”才算存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有利于维持大国之间的平衡,但却未能阻止这些列强们在 19 世纪中叶互相进行的多次战争。

可以看出,与欧洲观念的先驱者们相比,政治人物更青睐于战争手段实现联合或统一,如拿破仑,或企图引用均势理论以维持联合,如“神圣同盟”的建立,但都只是昙花一现,要么以残暴性贻臭名于后人,要么再次利用恰恰是均势“所要防止的事情——战争”达到均势。(〔美〕威廉·奥尔森等《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年,第 237 页)

六、近代欧洲经济和政治的二律背反

从十八世纪中叶开始,首先在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现代工厂代替了手工工场,资本主义大工业创造出的生产力要求突破国家疆界,实行更广泛的分工、交换。正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所说:“由于机器和蒸汽机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大工业脱离了本国基地,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169 页)同时,交通工具也不断改进,使全球范围的分工、交换成为可能。大工业也使资本主义竞争普遍激烈展开,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扩大了殖民活动。一方面是商品销售市场、原料产地的扩大,另一方面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增多,原来闭关状态更快地消失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生活又出现了重大变化。

第二次科技革命与工业革命,以电气化为代表,改变了各国的工业结构——重工业体系建立,使欧美各主要资本主义

国家完成了工业化，同时由于生产、资本集中又产生了垄断。垄断组织增加，资本主义扩张恶性膨胀。资本输出占主导地位，它深入生产、金融领域，工业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与落后国家的国际大分工出现，形成了新的国际经济结构。强大的工业后盾和先进交通、通讯工具使资本主义国家可能对世界进行控制。国家机器强大、垄断集中使资本主义国家加强了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统治，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资本主义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最终形成了资本主义无所不包的体系，确立了垄断对世界的绝对统治。凯恩斯认为：“在1914年以前，经济生活差不多完全是国际化的”。在整个过程中，欧洲一直走在前列。

然而，高度联系的欧洲地域经济并没有导致组成一个统一的欧洲。一方面，经济上的团结受到竞争的制约，随着工业的形成，竞争也就更加剧烈了。勒内·吉罗指出，与在大金融集团和大商业家集团里明显存在的“商业国际主义”相对立的，是“商业的民族主义”，它主要存在于对民族利益考虑得更多的工业部门。十九世纪末，经济上的竞争愈演愈烈，即使没有导致战争，也使各国间的气氛变得很沉重。

另一方面，而且是尤为重要的方面，经济上的联系虽然存在，但它却没有导致政治上的团结，也没有阻止住那些竞争的苗头。况且，民族主义这支新的力量这时占了上风。

列宁说过：“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在民族问题上有两个历史趋向。第一个趋向是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独立……”（《列宁全集》第20卷第10页）近代欧洲人有着许多充满诗情画意的思想，认为各国人民的“神圣同盟”取代君主们的“神圣

同盟”，自由与平等就会产生博爱。意大利民族思想家马志尼1830年说过：“人类就是所有祖国的联合”。可以说十九世纪前半叶的大部分欧洲爱国者都是“欧洲派”。1848年的欧洲革命是民族运动的总爆发，法国临时政府外交部长拉马丁发表了《致欧洲的宣言》，维克多·雨果在1849年的和平会议上向“欧洲合众国”发出了震撼人心但又含糊其词的呼吁。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思想家都持这种乐观态度，尤其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及马克思主义者。前者如蒲鲁东，他在1863年出版的《联邦原则》一书中，不相信会有一个欧洲联邦国家，因为大的民族将使弱小的民族窒息。他认为，要把欧洲组织起来，就必须在组成联邦之前把大国的权力下放。马克思批判了民族性的原则。他认为一个建筑在民族性和资本主义原则基础上的欧洲共和国是空想，只有当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各个民族才能和睦共处。

如果说人民的欧洲思想在十九世纪流传甚广，那么各国政治领导人却没有把这一思想付诸实施。

拿破仑三世在他执政初期曾帮助过民族运动的兴起，但当意大利和德国完成了它们的统一，他自己反被各种狭隘民族观卷走了。

至于俾斯麦，他领导完成了德国的统一，但当涉及到德国资产阶级所谓民族利益时，他便不惜践踏民族性的原则，吞并了丹麦、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和波兰。他还厚颜无耻地说道：“欧洲只是个列强使用的字眼，那些列强不敢以它们自己的名义去要求它们苛求对方的东西。”这种观察力又不得不令人佩服。

诚然，欧洲的版图随着意大利、德国的统一简化了：1858

年时的 57 个欧洲国家到 1871 年时变成了 25 个，但它们之间的争斗使得欧洲更难组织起来了。

1871 年以后，为了保持德国的优势和使大部分列强都隶属于德国，俾斯麦制定了一套用以孤立法国，阻止法国复仇的外交政策。这样就导致了 1882 年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之间的三国同盟，法国后来和俄国于 1892 年结成联盟，1904 年再度与英国签订友好协定。从此以后，欧洲好似平衡又恢复了，但这是比较死板的同盟所连结起来的两个国家集团之间的平衡，军备竞赛以及义务兵役制和武装民族观念的普及化都助长了欧洲日益加剧的不安定氛围。战争危险随着丹吉尔、波斯尼亚、阿加迪尔的危机周期性地出现，欧洲处在一个武装和平状态中。

所以，本世纪初，欧洲形势十分奇怪。经济上，所有欧洲国家的关系很紧密，当时有一个统一的经济地域存在：货币可以自由兑换，资本、人员可以自由流通，商品只要付不重且很稳定的关税便可以自由流通。同样还存在着某种共同的文明，因此可以说在 1914 年以前，在某种程度上有过一个欧洲，特别在经济和知识上是如此，亨利·红塔米纳在 1953 年发表的一部著作中对此作了证明，这部著作的取名即让人回味无穷：《欧洲在我们背后》。

政治上，欧洲是深深地分裂的。面对实用政策，各国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激化，帝国主义间的冲突，以及处心积虑地维持各个武装集团间不堪一击的平衡，属于一个高级共同体的感觉消失了。乔治·索雷尔 1908 年不抱幻想地写道：“在美洲，组成联邦的人都是一样的，生活在一样的国家里……但你想怎样把那些不是教徒就是神秘的革命者的斯拉夫人、那些